



天安門事件反思

張炳良著 勞寶霞譯

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接下來是蘇聯和東歐的鉅變，這一連串事件令我在重省中國歷史時不禁要自問：究竟在天安門廣場上發生了什麼事？這事件又代表什麼？中國共產主義的前景怎樣？中國的前景又如何呢？

我們若要找出構成現存系統內所存在的危機，並提出實際和合適的解決方法，必須先正確地洞識這些危機的所在。天安門事件發生至今已有一年，那些暴力和血腥的場面仍令人記憶猶新。但隨著時光流逝，當時因餘悸所生的高漲情緒已漸漸穩定下來。或許這正是我們以一個較為反省性和客觀的角度來重看這事件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來看天安門事件。最直接了當的是視它為共產政權鎮壓人民渴求民主的一個例子，將天安門事件看成是民主力量與極權主義的角力戰。如果我們這樣判斷這件事，解決的方法便十分簡單。你只

需以民主來代替共產主義，便可解決問題。然而，以上只是其中一種看問題的方法，我個人卻傾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問題。天安門事件背後有很多能夠反映不少矛盾的小事件，我相信我們要先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這些事件，才能正確地推測天安門事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問題

為何天安門事件會發生？這個問題對民運的支持者來說十分重要，他們認為天安門事件是一場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這看法從本身看來是頗為正確的。但當我從歷史角度再加以反省之後，我相信天安門事件不單是一場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而是中國在十年改革之後所產生的無可避免的後果。

天安門事件為何會在一個改革的年代發生？是什麼導致民主運動的興起？又為何中國政府要在這個官方御准改革的時候，採取這樣強硬的鎮壓措施呢？踏入一九八九年，一切都在變好。何以在當局

放鬆控制和比較自由的經濟環境下，人民會感到較昔日被壓迫的黑暗時期更為灰心失意呢？

首先，我們必須考慮一個經常被提及的因素：中共決定重整經濟，試圖在經濟上滿足人民得到更多自由和彈性的要求，但結果卻在其一黨專政的制度內產生矛盾。經濟改革的確令某些人在經濟的秩序下，得到某些行動的自由。結果，在某程度上，人民對國家和國家經濟的依賴便漸漸減弱；他們在文明社會中的轉業或遷移機會亦隨之增多。這樣發展下來，最終會無可避免地導致人民向政府要求一個難以與一黨專政相容及真正有活力的經濟系統。

經濟改革原是爲了累積物質財富，令人民過好日子，但改革發展下來，卻與國家的政治相抵觸。經濟的持續發展，導致社會不安；政治措施與經濟政策互相矛盾，愈來愈不能相容。這樣的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有關方面必須作出取捨。這些因素都構成了天安門事件的結構性背景。

天安門事件的第二個矛盾是改革政策的直接後

果，這個問題從經濟改革的本質而來：誰人會因經濟改革而受惠呢？改革最初的目標是為群眾賺取更多米糧，所以有關方面在一開始便集中在農村進行改革，強調有效的分配方法。在最初幾年，改革為每個人都帶來好處。但好景不常，在一九八四至八五年間，政府開始在大城市推行經濟改革，城市的貨物分配模式和結構都較為複雜，阻礙也特別多，自然會出現問題。人們開始發覺某些人在改革中較其他人獲利更多；更甚者，是某些人在改革中損人利己。

改革導致很多矛盾在幾個不同的層面發生。城市人覺得農民愈來愈富有；在這個似乎是富有成果的新制度內，幹部和政府官員感到不能趕上私人企業家的步伐；內陸和北部省份的人感到沿海城市正利用他們來漁利，他們所出產的原料受到政府的價格管制，但福建及廣東等沿海城市便可將他們的製成品輸出到免稅的經濟特區，並可累積利錢來建設自己的城市。總之，改革造成貧富不均的現象。

經濟改革分散了國家對財政的控制能力，導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分歧日增。十年改革之後，雙方的矛盾愈趨白熱化。在一九八七年，工資改革成為黨內的熱門論題。當有關爭論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討論的焦點卻突然由工資問題轉到中國經改方向的大問題上。一些改革者表示，國家應迅速轉向市場經濟的模式，他們認為這是唯一能夠解決中國問題的途徑。但反對者認為，在引入市場經濟的特色之餘，政府必須在社會主義的系統內保持一個商品經濟的模式。還有一些保守派元老下旨要求政府，必須用盡一切方法去保持中央在經濟計劃上的控制權。在十年經改之後，這些爭論更為明顯，並愈來愈偏向保守。

在八十年代末期，人們對改革的期望更高，因為他們察覺到結構性的限制阻礙了改革的進一步發展，改革者的承諾與改革所帶來的實際後果相距甚遠。中國當時陷於進退兩難：如繼續改革會產生很多問題；但如果不再朝改革的方向走，便會引起更

多的問題。黨和政府普遍都有一個共識，就是不能再走回頭路。（甚至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政府自己也曾承認改革方向難以易轉。據報鄧小平曾指出，學生們似乎攻擊制度內的一切，包括領導人在內，但他們並未說過改革的不是。）

現政權十分清楚，他們不能走回頭路。在過去數年，甚至是保守派的領袖也曾受過改革政策所帶來的好處。他們現在雖然不會太支持改革的某些方向，但仍希望改革繼續下去。他們亦是上述所指的第二種矛盾；亦即是從改革中獲益的一群。

第三個促成天安門事件的矛盾，是任何改革過程的通病，尤其適用在中國的情況。任何改革過程在開始的時候，都叫人民相信現況可以得到改善。當你在推行改革之前，必會向人民指出現有系統的不足之處，批評這些不善之處如何桎梏國家將來的發展，並會大事宣傳改革將帶來的種種好處。問題是，當你提高人民的期望之後，如果實際的結果與你所作出的承諾不符時，便會導致人民失望和憤怒，

並會開始質疑你為何會失敗。這便是中國在八十年代末期所面對的情況。

有些改革者高估了改革的成果。當時有不少從內地旅遊回來的朋友向筆者批評中國改革政策的方法，他們認為問題並非來自社會制度本身，而出在改革者身上。改革者給人的感覺是，他們只要說一句話，便可點鐵成金。如果你不替人民作好心理準備去迎接挑戰，問題一旦發生之後，特別是當你已經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之時，再呼籲人們忍耐和犧牲也不管用了。

我們必須緊記，改革者並非談革命；而是談改革。他們要改變制度，而並非推翻制度。他們亦非制度之外的人。事實上，改革者不單在現政權內工作，更是權力中心的人，所以他們才能有足夠的權力來行使改革。在位者經常希望能夠保持政體內的團結；甚至改革者也是如此，這實際上亦是他們的需要。為中國來說，便是要保持社會主義的秩序。這樣便制約了人們肯做和可做之處。於是，妥協便

成爲一個必然的規則。爲了不動搖現政體的權威，甚至是勇於改革的人也必須妥協。有關改革的四個基本原則在一九七八年頒佈，在反精神污染的時候又再度被提出來，重申改革的底線。改革活動只能在現存的制度內實行。改革的需要雖被確認，但只用來改善而非推翻現政體，以確保現政體能有效地運作。改革的領導人是否還相信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體系？這個問題仍有待討論。但如果改革者不想下台的話，他們便必須繼續肯定這些主義是基本地可行的，他們所做的一切也是爲了令這個體制更完美。

從支持民主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看來，我們很容易感到中國知識份子和學生對現政體的失望。他們是天安門運動的主要參加者；工人和農民的參與相對地較少。他們亦是在改革過程中獲物質利益較少的一群，他們的不滿也傾向理智的一面，他們較爲關心改革手段的黑暗面，並直指其非，包括：貪污、矯飾和其他小過失。

導致知識份子和學生不滿的主要原因是，改革不能提供任何明確的思想指導原則；並完全被物質主義所包圍。在中國的傳統裡，知識份子常負起維護社會精神價值的使命，其貢獻並非只是增加物質的財富。他們質疑的並非改革；而是政體本身。

上述的結構性因素及其內在的矛盾已存在著好一段時間，這些因素在改革的年頭變得更爲明顯，改革把它們呈現出來。昔日隱藏的因素，今天已被公開。但這些結構性的問題和矛盾本身不足以解釋天安門事件，我們必須考慮政府在處理那場民主運動時所犯的技術性錯誤，這錯誤導致該事件在日後演變爲一場血腥的屠殺。

天安門事件的處理手法

中共政權在起初試圖將問題訴諸意識型態，指學生背後有反革命的黑手，警告人們不要加入他們的行列。當這個方法行不通時，有關方面便採用較強硬的手段，在北京實施戒嚴，期望此舉可令抗議

行動終止，但結果卻以鎮壓行動結束。我們可從兩個角度來看鎮壓行動背後的動機：其一是假設政府本來不想用軍隊鎮壓這個運動，但因為用盡一切方法也無效，便唯有出此下策。其二是把鎮壓行動看成是當局打擊民主活動的預謀。但我們在現階段亦難以判斷何者較接近事實的真相，其中的細節到今天仍是個謎。然而，從中共政權以軍事武力控制局面的事實來看，她顯然是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而惶恐不已。當民變驟起時，任何有理性的政府都會在必要時用最起碼的武力來把它鎮服。中共政權用盡一切道德力量也不能控制當時的情況，便唯有用軍事力量。此舉對其信譽和管治的合法性也造成疑問。用軍隊去鎮壓人民，至少也導致管治者和被管者之間的關係緊張。

導致天安門事件的第四個結構性因素，是黨內的權力鬥爭。假如當時黨內沒有權力鬥爭，而趙紫陽派系和李鵬派系之間沒有嚴重的分歧的話，民主運動在萌芽初期便會受到控制，政府也會用較彈性

和懷柔的方法來處理當時的情況。隨著學生期望那個分裂的領導層會給予他們更大的讓步時，運動也開始升級。李派和趙派亦積極利用那些學生作為他們在權力鬥爭中的取勝本錢。

綜合上述各點來解釋天安門事件時，可以得到以下結論：中國八九民主運動並非企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而另立新制度。學生固然對很多社會現況不滿，但他們只是想有一個有代表性和對人民負責任的政府，並非要取代共產主義。這個運動本身是突如其來的。我認為這次運動是各方面計算錯誤的結果，不單學生和知識份子計算失準，黨內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也計算錯誤。我甚至可以進一步說，天安門事件並非是鎮壓的結果，而是由改革一手造成的。改革所造成的問題引發民主運動，亦導致隨後的鎮壓行動。當然，我們可以說，改革意味著現存的不佳狀況；如不予以改善，便會隨時出現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但至少我認為，這事是否嚴重到會令共產制度崩潰，便大成疑問了。

我認爲天安門事件代表著一場改變一個封閉自己和不再有效地運作的系統的運動。正當改革者在重整自己的時候，另一些在以往忽略了的問題又突然出現。我可以說，這並非是一場出於計劃的革命；而是一場出於錯誤的革命。我們不能輕信中國的問題只要用民主來代替共產制度便可解決。這並不是一個研究中國及中國問題的有效方法。我們必須從一個更廣闊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問題。

變與不肯改變

變與不肯改變的問題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在過去百多年裡，尤其在清末年間，中國人已有改變現存體系的意識。改變的觀念在起初未能獲得普遍人接受。但在西方帝國主義和西方思想的影響下，愈來愈多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士開始覺得需要改變。初時，所謂改變是指「中體西用」，整個體系仍保持中國的特質，西方知識只是一個改革的工具。直至十九世紀末期，人們發現以上的方法並不奏效，

因爲如要西方知識生根，系統本身也要改變。日後成立中華民國的孫中山認爲，西方共和國的民主政府模式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但當這個制度失敗之後，一班左翼知識份子在三十年代便開始從蘇聯的共產主義尋求出路。今天，很多發現共產制度不管用的人士也正四出找尋解決問題的方法。

但如果我們毫不考慮地堅持廢棄社會主義制度和開始另覓新途；我們是否在重複昔日孫中山和毛澤東所犯的錯誤呢？我恐怕方勵之等人對民主中國的強烈慾望，會令他們把問題看得過份簡單。他們似乎認爲，一旦中國人的人權獲得尊重；以及多黨制能在中國實行時，中國的所有問題便可得到解決。我認爲情況並非這樣簡單。

中國共產黨過去在社會上所做的一切，都反映出共產思想與中國人格格不入，它與中國傳統思想對社會性質的看法也不同。我建議大家參閱劉青峰和金觀濤所著的《興盛與危機》，該書以系統理論的分析方法，詳細分析由封建時代起至十九世紀末

的中國歷史。他們指出，在悠長的歷史裡，中國雖

然經歷了朝代的興衰，但在其系統內有一個基礎是恆久不變的，這個超穩定社會結構令中國的歷史持續不斷，其中包含了三個因素：第一個要素是統御了中國文化近三千年的儒家思想；第二個是維持公安法治的官僚系統；第三個是經歷了十數世紀仍沒改變的土地經濟。他們認為中國的政權更易和社會動盪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重整和更新這個典型的系統。當中國社會進入一個困局，而執政者又無法處理時，系統裡的基礎受到威脅，不同的革命活動便在群眾中紛紛冒起來。這樣的情況導致混亂和無政府的狀態，直至最後，由有計劃的武裝力量推翻現政權，平息動亂。這個過程大肆破壞中國的社會系統，但其超穩定社會結構卻不會受到絲毫影響。事實上，每個新政權的更易都讓這個超穩定社會結構有一個更新的機會，它的特色永不改變。兩位作者的討論到一九四九年便完結，我估計甚至在共產革命以後，這個在中國社會系統內的超穩定社會結

構仍沒有改變。

中國共產主義所代表的是對當時社會價值觀念的批判。部份左翼作家和工人從二十年代起便開始了這場運動。踏入四十年代，共產主義運動已發展成一個武裝反對力量；有新領袖和強大的工農基礎。中共利用揉合了毛澤東思想的共產主義來代替儒家思想，作為中央另一種統一思想的工具。至於在經濟方面，基本上沒有大改變。中國仍然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其經濟仍建基在土地上。

如果我們把中國共產主義放在變與排斥改變的歷史幅度中，那麼，我認為現在的鬥爭便是一場傳統與現代化、目標與手法之間的鬥爭。這鬥爭在歷史的不同時期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某些時候，傳統力量會較強；在另一些時候，現代化的力量又會佔了上風。

如果你現在用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天安門事件，你便會發現目前的制度在適應轉變的過程中，是多麼的徬徨失措。我敢說這個適應和反應的過程不會

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結束。天安門事件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反映出中國在接受轉變時的困難，這不單出現在社會互動的普通模式和矛盾重現的情況下，中國傳統對變的阻力在中國共產主義的影響下變本加厲。

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會繼續適應改變，亦同時排斥改變。這過程的進展會時快時慢，卻永不容易。目前有些問題是由共產主義帶來的，另有些問題是來自系統本身的，但無人能保證可輕易找到解決的方法。

此外，我認為當我們比較中國與蘇聯及東歐的情況時，要特別小心，因為二者的情況不盡相同。據我有限的知識所得，在一九八九年和九零年的東歐巨變中，有兩個因素是中國所缺乏的：首先，是反蘇的民族情緒。不少東歐國家從被佔領開始，便不斷想擺脫蘇聯的控制，但都為蘇聯軍隊所鎮壓下去。後來，蘇聯突然決定不再用軍事力量維持其控制，這是造成日後東歐國家鉅變的主要因素。另一

方面，蘇聯本身為國內每況愈下的經濟問題攪得頭昏腦漲，人民埋怨政府不能滿足他們的物質需要。長期的高壓統治令人民無發洩的餘地，反而增加人民的失意和不滿。於是，無數社會、經濟問題積壓下來，促成了日後的危機。

至於在中國方面，我認為國內的經濟情況並不如蘇聯一樣糟。事實上，自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經濟並無放緩，大部份人都認為自己的生活較數年前為佳。我曾在一九八八年造訪北京，但在天安門事件之後便沒有再回內地，直至九一年十月，我才有機會回京參加一個會議，卻意想不到發現內地有很多轉變，經濟進展的景象比比皆是。當然，政治氣氛便與前不同了。天安門事件之後，一切都受到嚴密監視。人們以往都不怕表達自己的意見，可是，現在很多參與會議的講者都不願公开发表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但他們在私底下也會跟我談談當日所發生的一切，訴說他們在坦克車駛進城時的感受。然而，我認為他們在公眾場合的沉默並不表示他們

害怕。令我感到驚奇的是，他們對國內所發生的一切都瞭如指掌。他們在天安門事件所汲取的教訓是：在時機未成熟之前，不要輕舉妄動。他們的思想已越過了歷史和保守觀點的限制，知道在下次行動時該走多遠。有人以黑色幽默來形容這個處境，指中國在今天的遊戲是：「等……死……等其他人逐一死去。」那些學生說：「或許我鬥不過你，但你活不過我。」他們認為時間是屬於他們那一方的，也屬於轉變和改革那一方的。

在這種樂觀的氣氛下，我認為民間力量已開始集結起來，他們的存在已表示有某程度的自由空間正在發展成長。這自由與確認人權和政治自由不同，但卻能在目前的政治氣候下，為人們的活動提供某程度的空間。然而，要經常跟軍方勢力打交道，是生存的基本事實。另一方面，包括不少中級幹部都仍然繼續支持改革，這是我在九一年十月的探訪旅程中所得到的最清楚訊息。他們現在說的是：「讓我們只管做，不要說吧。只有和平演變才可以救中

國。共產主義應否繼續存在不是我們最關心的事情，跟領導層爭論這個問題也無意思。只管繼續開展事業吧，讓我們完成一件事之後，看看它帶我們走多遠，然後由它再繼續前進。」這種態度或許是現實了一點，但絕不是悲觀。

總結

讓我為我們在天安門事件前後的普遍情緒作一個總結，我認為在天安門事件之前，我們有些人或許是過份樂觀了，不少人以為真正的民主會像翌日的朝陽般在旦夕間出現。結果，在軍隊的鎮壓行動之後，我們卻又表現得過份悲觀。我只能這樣說：我們必須深入地研究天安門事件，才能明白事件的真相及其背後的意義，因為它不但關乎中國的過去；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國歷史的一部份。